

薛暮桥晚年文稿

薛暮桥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薛暮桥 著

薛暮桥晚年文稿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薛暮桥晚年文稿/薛暮桥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3

ISBN 7-108-01186-7

I. 薛… II. 薛… III. 薛暮桥-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文集 IV. F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887 号

责任编辑 贾宝兰

封面设计 董学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 数 242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8.60 元

编者序

薛暮桥同志是我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六十多年来他以全部身心投入了党的经济工作的实践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30年代,他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深入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正确性。40年代,他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取得辉煌的胜利,并在货币价格理论上作出了国际领先的创新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处于我国经济工作的领导岗位上,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发展和改革的全过程。特别是在1949年—1956年期间,作为中国经济工作领导人陈云的主要助手,他在稳定物价、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制定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8年)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他以古稀和耄耋之年，精神奋发，积极投身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他作为国务院经济政策高级咨询机构的负责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致力于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决策咨询工作。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他研究经济发展战略，设计体制改革方案，筹划改革的操作步骤，为中央领导出谋划策，并且对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分析和广泛的宣传。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他作为中央领导的高级参谋和经济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薛暮桥辛勤笔耕，著述丰硕。而1978年后的20年，则是他一生著作最多、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可以说是他理论研究的黄金年代。由于他长期处于经济工作的领导岗位，同时又一贯重视理论研究，使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的危害、僵化的经济体制的弊病，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应走的道路等问题，具有独到的深刻认识。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他刻苦勤奋地写论文、做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 and 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宣传。他的文章不仅对当时实际工作发生很大影响，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把这些论文汇编成集，对于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和经济思想发展史，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在80年代，我们曾经把他在1978年后所写论文汇编成册，陆续出版了几本论文集。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汇集了1979年—1980年所写论文、报告；1982

年出版《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 and 改革》，汇集了1981年—1982年所写文章；1986年出版《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汇集的是1983年—1985年的文章；1988年出版《改革和理论上的突破》，汇集了1985年—1987年的文章。这4本论文集，汇编的只是作者在1987年以前的大部分文稿，至于1988年以后的文稿，则一直未曾汇编成集。即使是1990年出版的按专题选编的《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只收进了1989年后许多文稿中的4篇。这几年的论文，对于克服我国改革征途上的曲折，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所以，继续把1989年后文稿汇编成集，我们认为是十分必要的。

1996年9月《薛暮桥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薛暮桥办公室内留存的文件档案再次进行清理，发现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二十多篇论文、信件、报告，还有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所写而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一年来我们几次建议把这些文献选编成一本新的论文集，在我们一再要求下，最后得到作者的同意，终于汇编成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收集到本书中的论文，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在1988年末到1992年间所写文章、报告、信件，这部分构成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是1978年—1988年所写而未曾发表过的文稿，并附录有60年代未曾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这一部分可以说是过去几本论文集的补遗。

薛暮桥是一位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论述从来都是出自当时经济工作的实际需要，阅读他的著作必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面对的问题。本书第一部分论文写于1989年—1992年，关于这一期间国内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以及作者的政策主张和学术思想，在《薛暮桥回忆录》第11—12章中有精辟的叙述，建议读者参阅《回忆录》这一部分，这将有助于理

解和把握这些论文的内容、精神和它的意义。

这里我们简略地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和论文的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五年经济调整 and 改革的初步探索，到1984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出现了大好形势。当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在全面推进改革的条件成熟的大好形势下，实际工作中却发生了并非不可避免的失误。1984年末在微观放活的同时忽视了宏观调控，引起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出现了“超高速”增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势头。当时国务院决策人虽然在开始时曾正确地决定实行财政和金融双紧政策，但在1986年初经济过热刚刚有所抑止的时候，他就顶不住许多地方和企业强烈要求放松信贷的压力，并且接受了一些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鼓吹用“适度通货膨胀”刺激经济“起飞”的错误主张，从第二季度起就大幅度放松信贷。此后他口头上多次讲要实现“软着陆”，而实际上却把注意力放在追求低效率的“超高速”，放纵通货膨胀，忽视及时建立适应商品经济的新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结果，在1986年—1988年3年间，宏观失控日趋严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愈演愈烈，产业结构重新失调，经济秩序混乱。1988年夏又想绕过制止通货膨胀来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消息刚刚透露，立即引起提存抢购风潮。这次风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促使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方针，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进入一次新的转折。

在改革遇到曲折的情况下，作者在本书的一系列文章中，系统地陈述自己的政策主张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他对治理整顿表示积极支持，认为治理整顿虽然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进行

的一次新的调整，但在既定形势下，这一决策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作者非常重视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指出稳定是顺利推动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条件。他强调只有决心治理整顿，才能稳定经济，为进一步深化改革铺平道路。

在这些文章中作者深刻总结了改革遇到的曲折和教训，批评了前一时期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他直率地批评把注意力放在追求“超高速”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并批评“通货膨胀有益”的错误理论，主张在改革进程中要坚决防止通货膨胀。他指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制止通货膨胀的正确途径，认为前一时期实际上陷入了“放开货币，管住价格”的本末倒置的错误，主张按照经济规律执行“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正确政策。这些文章中的论述，把作者关于货币价格的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在改革进程中防止通货膨胀，作者力主加强宏观调控。在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他强调指出，在体制转轨时期，越是放活微观，就越要重视宏观调控。在缩减指令性计划同时，应当尽快学会运用经济方法、运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经济杠杆加强宏观调控，尽快建立和完善间接调控体系。他认为治理整顿不是要放弃市场取向的改革，去走回头路，而应当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努力建立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新的宏观调控体系，代替产品经济基础上的旧的计划管理体制。他反复论述财政、税收、银行信贷是商品经济中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阐述灵活运用这些宏观调控工具的方法艺术，主张不失时机地探索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途径。他的论述，代表着当时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保证稳定经济和体制转轨取得成功的正确对策。他的主张的正确性，在当时以及1994年后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明。现在看来，

这些政策主张和理论分析，具有超出一国范围的重要意义。

在此期间，我国理论界再次发生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当时，面对国内经济上宏观失控、政治上发生风波、国际上又出现东欧剧变的形势，有的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发生怀疑，重新提出坚持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他们把前几年宏观失控归咎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是过分推崇市场作用、脱离了计划经济轨道的结果，他们发表了不少文章，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把计划和市场问题，归结为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问题。

作者对那些发动错误批判的文章很不以为然。他在论文中一再强调，1985年—1988年宏观失控和经济混乱，并不是商品经济转轨的必然后果，而是体制转轨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同志追求“超高速”而忽视宏观调控，没有及时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结果。他说：“有些同志认为这种混乱是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是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引起的市场混乱，这种认识是很错误的。只要抓紧宏观调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混乱。”1990年7月政治局常委邀集部分经济专家座谈经济形势，会上在体制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问题上意见分歧。作者在会上作了发言，事后又写了“深化改革，摆脱困境——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信中重申作者对1985年—1988年宏观失控原因的科学论断，分析了治理整顿一年半来出现的新形势，同时解剖东欧剧变的教训，建议中央当机立断，稳步地“推进建立奠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管理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主张抓住当时制止通货膨胀已取得成效的有利时机，价格政策从管制转向调整；尽快健全财政税收的调节功能；尽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在创造必要外部条件同时进一步

探索企业体制的改革。作者坚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面对社会上出现企图使改革逆转的倾向，作者认为有必要对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经济从理论上予以论证。1990年底作者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商品、货币、价格、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企业制度、所有制等10个问题，联系实际进行分析，把作者多年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作了一次综合的系统的论述。1991年5月，作者卧病稍有好转，又写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一文，试图具体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经验，说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正确性。文中说：“从理论方面来说，我看首先应当纠正过去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既然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商品就不能没有市场，不能不让价值规律对商品价格发挥调节作用。商品同市场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治理整顿的目的是为深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铺平道路。如果继续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是肯定找不到深化改革的正确道路的。”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作者在病床上听到传达，对小平同志讲话表示衷心拥护。作者完全赞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认为这一提法最确切地表达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最明确地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的改革，不仅一般地要求在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而是要在总体上放弃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使市场机制对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宏观调控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应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当时

作者卧病在床，但是有些报刊、出版社纷纷向作者约稿。作者接受了约稿请求，在1992年7月、9月、12月连续发表3篇文章。由于作者在病中不能亲自执笔，只能请有关同志按作者授意代为起草。这3篇文章是吴凯泰同志代笔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李剑阁同志代笔的《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3篇文章虽然主题不同，角度不同，但归结到一点，都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从理论上论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的正确方向。作者认为这些文章准确地反映了他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学术水平，可以看作是他的治学生涯的简单总结，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的殷切企盼。因此在编辑这本论文集时，我们把《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一文放在篇首。至于作者最满意的《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一文则已收入《薛暮桥回忆录》作为附录，本集就不再收入。

本书第二部分是作者在1979年—1988年间未曾公开发表的一部分文稿。这部分文稿时间跨度较大，跨越了改革开放的两个阶段，即1979年—1984年国民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起步阶段，和1985年—1988年改革开始全面推进及宏观失控阶段。在1979年—1984年这些文章中，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理论家，作者以丰富的经验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僵死的计划分配资源和计划定价制度，系统论证了“让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发地调节价格”的市场制度的有效性。同时，作者力主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并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初步的探索。1980年他为政府草拟了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1981年—1985年期间，他又组织了对价格、金

融、财税等体制的研究，并提出改革的意见。这些意见既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又切实可行。凡是得到采纳和实施的，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他还率先提出不仅要在分配领域进行改革，还要在流通领域进行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1986年—1988年的几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反对通货膨胀，要求加强宏观调控。这些文章只是作者在当时政策咨询和理论研究所写文章的一小部分，实际上是过去几本论文集的补充。阅读这些文章时，最好同过去出版的几本论文集结合起来研究。附录在最后的《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纪要》，是1961年作者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对大跃进、公社化后农村中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对于60年代初经济调整工作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反映了当时既想纠正错误又难以纠正的困难处境。

薛暮桥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和实践家，他在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他在实际工作中不是局限于具体业务，而是一贯重视理论研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他的理论研究从来都是出于经济工作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关闭在象牙塔里从事不切实际的空谈。有的同志说：许多实际工作者钦佩他的深厚的理论造诣，而很多经济学家赞扬他实际工作经验的丰实。阅读他的论文集，既可以研究我国经济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也可以体会他的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学风。编者盼望我国后起的经济学家能够更好地发扬这种优良的学风。

吴凯泰

1997年9月24日

目 录

1

编者序

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1
认真总结十年改革的经验	48
——一个主要教训	
试论广义的价值规律	58
关于改革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	68
——就《关于改进计划方法的一些设想（初稿）》给国家计委党组的一封信	
治理整顿是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	76
——1989年《中国经济年鉴》代序	
建议改革财政承包制度	82
牢记历史经验，坚决执行治理整顿的方针	87
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些看法	95
——就“八五”计划给马洪同志的一封信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统盘考虑	98
——就“八五”计划给马洪同志的一封信	

再论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	101
——给国家计委的一封信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107
——1990年《中国经济年鉴》代序	
深化改革，摆脱困境	114
——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	
从保护转向竞争	125
理顺物价 平整市场 深化改革	130
——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138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	162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序	174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	179
根据实践经验来回顾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	189
从上海体制改革调查所看到的问题	212

目 录

3

关于体制改革的意见	224
——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的提纲	
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	230
——在第七次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	235
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	242
——在广东省委报告会上的讲话	
流通领域要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258
统一思想 克服经济困难	264
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何在	277
——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封信	
建议把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到比较重要的地位	282
——给万里同志的一封信	
关于恢复和发展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意见	283
——给赵紫阳同志的一封信	
对《物价管理条例》的意见	287
——给张劲夫同志的一封信	

关于改革钢材分配办法的建议	291
——给薄一波同志的一封信	
对调整价格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建议	292
生产资料调价的关键是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300
——给赵紫阳、田纪云同志的一封信	
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和通货膨胀	304
——近8年经济工作的反思	
建立和发展行业民间自治团体	315
地区规划必须服从全国统一规划	321
——关于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之我见	
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纪要	325
后 记	333

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 形成和发展*

薛 暮 桥

我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既不可能产生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也不可能产生于忙忙碌碌而毫无思考的实际工作，而只能产生于扎实理论同艰苦实践之间的结合。当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在这两方面可能有所侧重，但决不能有完全的偏废。而我，长期的实际工作，对我的经济观的形成，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可以说，我的经济观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参加大量实际工作的同时，我始终注意理论学习和理论思考，这对于我透过经济现象认识问题的本质，找出我国经济的运动规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从1932年开始经济论文的写作，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了。在60年里，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风

* 江苏人民出版社约写此文，由于我年迈，体力不佳，故请李剑阁同志将我的有关论点整理成这篇文章。此文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我的经济观点。——薛暮桥